

对“文如其人”的批判性思考

李剑锋

(唐山学院 文法系,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在对中国传统文人的品评体系中,“文如其人”长期占据着正统地位,然而,文人为人与为文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文人的伪饰意愿、中国特有的文艺土壤、审美活动必需的距离感、文艺自身的超越性等都会产生人为人与为文的背离。因此,对于“文如其人”以及人为人与为文的背离现象需要进行批判性思考,辩证看待。

关键词:文如其人;为人;为文;批判思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5-0070-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5.012

Critical Thinking on “The Writing Reflecting Its Writer”

LI Jian-fe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Law,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n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i, “the writing reflecting its writer”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orthodox idea. However,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writing and its writer can be commonly found. As for this case, there are many reasons, such as literati’s intention to disguise themselves, the special soi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the sense of distance required by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itself. Therefore, the idea that the writing reflects its writer, and the deviation between human and literary,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 critical thinking and dialect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the writing reflecting its writer; as a man; as the writing; critical thinking

自古至今,我国就是一个注重道德修为的国家。纵览中国文学史,“淡泊宁静”“高洁傲岸”一类的道德评价是对文人至高的褒扬,而且在儒家思想的文化影响下,人为人与为文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文与道的相促相长,是我国文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因此,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品评体系中,“文如其人”长期占据着正统地位。

然而,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今天,我们

不得不承认,中国文人为人与为文背离现象在文学发展史中广泛存在。有些文人做人伪善,为文清高;相反,有些文人做人谨重,为文放荡。因此一直以来对“文如其人”的质疑之声、对“文异于人”的辩护之言层出不穷,且都有理有据,言之凿凿。

一、“文如其人”的论争

(一)肯定的观点

纵观我国历代文论可知,是汉朝思想家扬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7JY080)

作者简介:李剑锋(1964—),女,河北卢龙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逻辑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

雄首次提出“文如其人”的观点,他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他认为无论言还是书,本质都是心灵的表现。因为语表心声,文现心画,所以透过人的言表和文章足以知道这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凭借一个人表和里的一致或矛盾,可以看出此人的品性。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认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雋,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言情性所铄,陶染所凝。”^[1]这与扬雄所述的“言”和“书”,所以二人都肯定了为人与为文的统一性。不同点在于,刘勰直接以“情”与“理”为主导因素和基础因素,强调由于内在的因素制约而见诸外显的符号形态,与扬雄以外在的符号形态而判断人的内质的思路是相反的。另外,刘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要比扬雄更加具体,将“言”与“文”作为文章的表象,认为它受“才”“气”“学”“习”四个因素的制约,可以说比扬雄更加全面地论证了“文如其人”。

苏轼的文学成就无不表现出对“文如其人”的执着坚守,其文学创作在作品风格方面坚持返璞归真,学术方面推崇“自然本体论”。他的诗词把缘情和言智结合起来,刚柔并济,体现着其特有的审美主张。苏轼提出了“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文人合一、文如其人是这位文学大家评价诗文和文人关系的标准。

(二) 质疑之声

梁简文帝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指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有力地批驳了儒家诗教观中为文“思无邪”的道德说教,他提倡以性灵执笔抒怀,放荡为文,不能囿于“文如其人”的评价理念。

同样具有“文如其人”的“叛逆”之心的是金代元好问,他在《论诗绝句》中直指扬雄的观点,“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2]这里的安仁即是西晋的潘岳,以潘岳的“人”“文”背离反驳扬

雄的“心声心画”说。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引用《庄子·列御寇》中的孔子言论“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指明人的外表和内质不一定统一,人心太难琢磨。他又说:“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1]他认为文人的为人与为文既可能一致,也有可能大相径庭。并且他列举了历代文人的“文”“人”背离现象,说明了“以文观人,自古所难”的道理。

诸如此类,从古代到现代对“文如其人”皆有质疑之声,但由于儒家诗教观的政治地位,对背离现象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引起传统文人的重视。下面通过列举为人与为文背离的典例,以事实为依据,阐述在儒道的思想体系下中国文人言行关系的复杂性,说明文人为人与为文背离现象的存在现实。

二、为人与为文的背离

(一) 为人伪善,为文清高

前文有言,我国是个注重道德修为的国家。道德说教不仅多见于文学作品中,更体现在对人尤其对文人的道德约束上,如言必行、行必果、言行一致、人文统一等道德要求。“言行不一,道貌岸然”“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是遭人唾弃的,即便这些人有超人才华、旷世杰作,也掩盖不了其德行上的瑕疵。

在讨论伪道德文人的文章中,多会提到潘岳。西晋泰康年间的诗人潘岳,曾经名重一时,其文广为传诵,他擅长在作品中描绘自己淡泊利禄、情志高洁、忘怀功名。《闲居赋》以转绕指之钢舌,掉绝丽之妙文,写自己的道德至上,“身齐逸民,名缀下士……教无常师,道在则是”^{[1]4};写自己的田园兴致,“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莖芥甘旨,蓼菱芬芳,囊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4]9}。单从此诗会以为

潘岳是一位超凡脱俗的贤人达士,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钻营利禄、躁求荣利、谄媚权贵、吮痂舐痔的无耻小人。西晋晚期,在贾后的庇护下,贾谧权倾朝野。为了获得更高的声望和附庸风雅,贾谧广招人才,潘岳因为他的才气被选入贾谧门下。他对贾谧阿谀奉承,遇到贾谧乘车出行就望尘叩拜,尽显此人的卑躬屈膝的本性。二位贾氏试图暗算太子以谋取大权,酝酿出了借太子之名写祷神文以告其谋反的伎俩,这份汇集野心家丑恶行径的祷神文就是潘岳“秉笔直书”的。得益于自己的谄媚之功,潘岳步步高升,权钱加身。这就是人格复杂的潘岳,为文的清高与为人的伪善集于一身。

谈到周作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美文。周作人的散文,着力于描写花鸟鱼虫、美酒佳茗,显见他闲适淡泊,尤重趣味。他强调:“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有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5]在散文的写作上,他强调,必须“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6]。可见,周作人在散文中追求的雅致是知识性与趣味性两重统制的内容与自然大方的语言形式的完美结合。因此,他的散文以简约亲切、清隽幽雅的闲适风格在现代散文史上别具风韵、独树一帜,被后人称作是独创散文价值标准的美文,他的美文也在意境悠远和文字耽美等多方面创造了中国现当代散文艺术的极至。周作人的人格倾向于传统士大夫型,虽然他学贯中西,但他主要以儒学体系为学问根基,他深谙儒学经典,尤其对《论语》研读很深,儒士的人格性情促成了他对朴实唯美、平和冲淡的写作风格和日常生活模式的渴望,超脱了当时恶劣的现实状况,达到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这么看来,周作人要么是个寄情山水的出世文人,要么是个忠君为民的儒将。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他却成为了一代汉奸。在日本占领北京期间,周作人担任了汪伪政府的要职,成为“汉奸文人”之首,留下了一

片骂名。虽然今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历史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说他是日本文化的欣赏者也好,或是超脱国家概念的淡漠者也罢,但事实是不能抹杀的,他在乱世中选择了投敌,他就是汉奸,而且在事后又不能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无异于加深了他自己的罪责。可见,闲适儒雅的文字下掩藏的是一颗“背叛”的灵魂,怎能不令读者失望?

(二)为人谨重,为文放荡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即便是被视为有文化瑕疵言行不一的人,其“言”也是多符合社会约束的,若所做之文都背离了社会规范,怎能称得上文人?所以,前人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为人”的道德失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严格归并我国文人的背离问题,前人单一的研究并不能全面概述此现象,如果这些研究武断地将“为文”定格在道德层面,那么“为人”的背离势必在伪善,然而,优秀的文章并非皆因包含或宣扬正确的价值观见长,犀利的文风、优美的文辞、跌宕的情节等都是好文章的要素。因此,与如前所述的“为人伪善,为文清高”相对立的背离现象也是存在的,根据梁简文帝萧纲提出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暂以“为人谨重,为文放荡”概述这类现象(诚然,萧纲这句话的原义并不是指文人的背离现象,“谨重”和“放荡”在文学理论中也并非一定背离,但单单对现象而言,两者确实是背离的)。

萧纲在文学上积极创新,不拘一格,就像他的文学理论一样,擅长“不及君子之听”的“放荡”文学,在当时被人们称为“宫体诗”。宫体诗追求声律,夸耀辞藻,内容则着重描写情色,这种文学作品是南朝统治阶级上层奢靡颓废生活面貌的集中反映。流传下来的萧纲的诗有近三百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体诗。这类诗多是关于女性和男女之情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属于传统的“闺怨”题材,写女性爱情生活中的失意和悲哀;另一部分着重描写女性的容貌、体态、举止以及女子的生活环境、所使用的器物等,甚至把女人的衣饰、绣鞋、衾、枕、席、帐等都当作

描写的对象。描写女性,以她们作为诗歌的主人公,本无可非议,但萧纲诗中所描写的却是如后人所概括的那样“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上;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7],粉脂味和色情味极浓,广受后世非议,若不是他天赋英才,其诗文采飞扬,状物细腻,他也就早就被后人遗忘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了。然而,作为一朝统治者,他却为人谨重,为政保守,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家所拥有的野心与谋略,逐步沦落到了受人左右的地步,直至大宝二年为侯景所害。

王小波是在我国当代文学界有着特殊地位的作家,他的作品有着大胆荒诞的叙事、机智幽默的反讽、循环跳跃的结构、自由深刻的思想,广受读者喜爱,使他成为一代年轻人追捧的偶像。几乎在每一篇小说中王小波都设置了“王二”这样一位叙述者,而且王二身上有着作者王小波身上的某些特征,这样沉浸于其作品中的读者,很容易将王小波塑造的王二理解成现实中的王小波,形成对作者和小说人物等价认同的一种阅读状态。现实中的王小波的确和王二有着一样的人生经历,在云南农场下过乡、北京工厂做过工、美国留过学、大学中当过讲师……然而王二机智油滑、投机取巧、风流倜傥、猥琐放浪,却不是王小波的真实人格形象。王小波为人厚道,正直,讲义气,上学期间是个老好人,对同学提出的要求从来不会说“不”,和每一位同学关系都很好。王小波工作中踏实勤奋,在美国留学时生活困苦,他同时打好几份工,由于英语不好,也常受人欺负,这是他最不愿回首的往事,敦厚老实的王小波远不及王二那样投机、油滑。王小波对待爱情,用情至深,对爱专一,追求李银河让他煞费苦心,他爱得热烈,也爱得浪漫。李银河近年来整理了王小波当年写给她的情书,集结成《爱你就像爱生命》后出版,其中的情书语录“不一定要你爱我,但是我爱你,这是我的命运”“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包含了王小波对李银河的真情^[8]。另外,王小波和李银河在美国艰辛求学、相濡以沫的故事更是让知情人感动。这样的王小波怎能被视为拥有着陈清扬、二姐子、线条、

小转铃等诸多“妻妾”的王二?

三、背离现象的原因探析

探究中国文人为人与为文背离现象产生的原因,可分为三个研究方向:第一,就文人角度而言,不能排除他们其中一部分人自身就存在伪饰意愿,由于文人的个人因素,确有个别伪饰分子,不能被历史原谅;第二,就客观环境而言,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文艺土壤,在此成长起来的文人都带有时代的特征,背离现象在我国特有的文艺氛围中产生也是在所难免的;第三,就文学作品而言,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具备艺术的特性,由于一般读者对文学创作的不解和欣赏技巧的偏差,容易对为人与为文是否背离产生误解,具体可以从审美活动必需的距离感和文艺的超越性两方面进行讨论。

(一)部分文人的伪饰意愿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主观意愿便是文学创作的内因,文学创作的主观因素,是指进入创作过程并作为创作主体出现的作家的自身条件,包括作家的才情、知识储备、气质、世界观、人生际遇、文艺修养等。它们从各自的角度影响作品的形成。其中,世界观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描写客体的确定,到描写角度的选择,再到作者所作的道德伦理评价、社会政治评价和审美评价等,都是在世界观的影响下展开的。

然而需要重视的是,能够从根本上制约作品风貌的主观因素是文人的特定气质,这就是魏晋文艺理论家刘勰指出的“肇自血气”。文人特殊的人生道路和生活体验,文人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和人情冷暖,都会影响到他的创作风格,从而在他的作品中留下印记。另外,文人多方面的才能,包括文艺鉴赏力、体悟生活的能力、捕捉细节和形象的能力、表现艺术的能力,以及文学之外的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的艺术素养,都是影响作品形成的关键因素。至于文人个人的才情、禀赋,它们对其作品创造风格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东汉王充在《论衡·佚文篇》一文,写到“文德之操为文”,这是指作家在文章中必须流露思想,而思想体现文风,文风则展示文德,文章道

德才是文章美感的内在要求。好比一位舞蹈演员,无论她的为人如何,在表演时仍会以最美丽的装扮,把自己娴熟的舞姿展现给观众。所以说,文学的创作者为人与为文相吻合常常是相对而言的。因此,对于文章道德,有德有才者必有之,无德有才者亦有之。也可以这样认为,文人的善与恶在为文时,时而脱离,时而相合。有道德修养的人会注重修为,即便在文章中,也会表现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而无道德修养的人,因还懂得最基本的道德观,因此,在写文章时,可能会披上真善美的外衣。

为人伪善、为文清高的文人,大多是具有伪饰意愿的文人,本身就想着如何装扮自己,做一个道貌岸然的文人。潘岳就是这样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的仕途野心,将自己写的那些道德文章抛之脑后,将自己作为一个士大夫应有的道德操守忘得一干二净,将自己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忠心弃之不顾,阿谀奉承,陷害忠良,为政治野心家服务,亲笔书写污蔑君主的文告,这样的行为与其文章中宣扬的道德礼教完全不符,后世的评论者将其视为“文”“人”背离的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中国特有的文艺土壤

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的成长土壤最大的区别在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长期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奠定了我国文学的理论基础,对中国文人的塑造和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主张“仁义”和“礼教”,从“仁”拓展出一系列的社会伦理体系,由“仁”演化出一系列的国家政治系统。以儒家诗教观为代表的具有政治教化作用的儒家哲学,依仗政治权力的庇护,始终盘踞在我国封建文人品评体系的统治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威的文化工具。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9]孔子认为,学诗就是为了从政和专对,否则诗读得再多,也是没有用

的。孔子还把诗的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①,而“兴观群怨”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忠君”“孝父”。“兴观群怨”是孔子诗论的核心,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历代文论都对其进行了阐发。

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便是儒家的诗教观。孔子在《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针对文人,孔子强调文人的态度和创作动机应“思无邪”,在复杂的文学创作中实现文以载道,文字内容指向大忠大善,对读者的教化作用要远高于审美、宣泄等功用;二是针对读者,孔子认为,读者应抱着受洗礼的态度去阅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阅读的效果要有醍醐灌顶、脱胎换骨之感。这种教人为善的为文思想严格地钳制着整个封建文学的发展,成为中国文人的为人准则和为文标准,我国文艺思想的长期僵化、文学创作的因循守旧是受其影响的结果。人的本性中都有张扬个性的一面,儒家诗教观恰恰限制住了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人性自由的彰显,将创作思想格式化,有些在生活中崇尚自由的文人,在创作中也不免拘谨,同样,那些在生活中违背道德的文人,在创作中也要言说伦理,鼓吹道德。这便形成了读者眼中的背离。

另外,中国曾长期处于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导致思想相对保守,文艺创新步伐相对缓慢,陷入迂腐发展的怪圈;存在重文轻理、重实践轻理论倾向,文艺理论虽来源于创作实践,但理论得不到足够重视,对创作的指导作用甚微;文艺形态崇尚玄虚唯美,对文人提出过多、过高的理想化的要求……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文艺土壤,虽然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大批浩然正气、慷慨激昂的道德文人,但也难免会有滥竽充数的道貌岸然之流。

(三)审美活动必需的距离感

审美经验中有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审美距

^① 兴观群怨:出自孔子《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对古代诗歌社会作用的申明和赞扬。

离,其中包括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心理距离和情感距离。审美距离起到连接审美的主体读者和客体文艺作品的作用,对审美活动的无功利性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个概念首先指出了审美对象,其次唤醒了作为审美主体应有的审美能力。由这两点组成的审美距离在审美经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纳兰性德的词为例,感知纳兰词的悲剧美、隐晦性和朦胧美需要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才能完成。读者作为审美主体,只有和审美客体保持适当的距离,审美才能达到神奇的、超脱的效果,才能从中发现美的本质。纳兰词特有的美源自作者遣词造句的非凡笔力,作者的禀性、命运、志向以及社会环境制造了纳兰词的凄清婉丽、幽怨缠绵、哀恻动人的艺术氛围,然而诗中的悼亡之哀及产生的悲情之美却是来自于纳兰性德高超的“距离”创造能力,读者只有达到了这样的审美距离才能感受到。

再以背离现象中王小波的文学作品为例,读者在观审这些作品时应当保持恰到好处的审美距离,“距离”太近,会将感性的文学作品进行过多的理性加工,会不自觉地思考作品中的王二是不是现实中的王小波,作品中王二有那么多放浪的女人,难道现实中的王小波也有那么多女友?诚然这些思考都是多余的,但热读中的读者对这种思考却是不由自主的。当读者一旦真正了解了王小波,自然会感觉为人与为文的背离。那“距离”太远呢?也是不可取的,一味地沉浸在文字表面的欢愉之中,阅读的效果便止于肤浅了。只有保持适中的审美距离,才能读懂王小波那颗崇尚自由的心,才能震撼于王小波神奇、跌宕的文笔,才更能理解现实中的王小波。

一般的读者在文学欣赏时忽视了审美距离的重要性,在“冷眼旁观”或“深情热读”的过程中,将作品人物与作者本人做盲目对照,主观臆造联系,以文观人,用文如其人加以断言:高洁的文字即高尚的文人,放荡的行文即无良的文人。这种忽略审美活动中必需的距离感,难免会出差错,由此产生为人与为文背离的认识

乱象。

(四)文艺自身的超越性

文艺超越于现实,超越性是文艺的特有属性,超越性主要表现在文艺高于现实的创造性上。相对于理想而言,现实是苦难的,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文艺世界中的“真善美”正是现实理想的具体化,文艺的宣泄与慰藉功用便是由此产生的。文艺给欣赏者带来宽广的想象空间,使欣赏者的精神得以安抚,生活得以激励。文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所以文人在创作过程中构建的精神境界必然高于现实。

说到文艺理论中的“想象”,在此有必要加以阐述,“想象”在文学史上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如今作为文艺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借助科学的分析研究法,我们不仅能够区分“幻想”与“想象”,而且还可以将想象分成两种具体情况,即第一位想象和第二位想象。柯勒律治指出:“第一位想象是创作主体在其创造活动中的一种能动的知觉能力,是在自觉的情形下进行的;第二位想象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而且为了进行‘再创造’,它要‘融化、分解、分散’客体。实用主义美学家杜威从美学的角度肯定了想象的作用。”^[10]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审美的经验是想象的,想象是结合文艺中所有因素的一种能力。得益于想象的文学之美表达了作家的艺术追求和精神理想,在这点上迥异于自然之美。

文学的超越性决定了文学不能是现实的机械复制,缺乏创造性的文学索然无味,势必不会被大众接受。优秀的文学作品探索历史,拷问现实,抒发理想,憧憬未来……由文学产生的审美效果可见,超越性对于文学艺术的意义至关重要,超越性成为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中必备的特征,给文学艺术植入了超越现实的羽翼,有利于人们借此在心理上弥补现实的遗憾,获得心灵的寄托。

作品的超越性决定了作者其人与其文的不对称性,这里仍以周作人为例来说明。周作人的文学意境不仅超越了其自身的生活处境,最主要的是远远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民众诉

求。民国年间,列强入侵,国将不国,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人民一心想的只有和平与民主,而周作人却沉浸在花鸟鱼虫、美酒佳茗之中,置国事国难、民情民怨于“不顾”,潜心创作他的美文。更甚的是,没有政治原则的他随风倒地服侍了汪伪政府。或许这就是他的文艺的超越性,但是这种在思想上放弃了家国情怀的文艺的超越性终究失去了它的精神内核。因此,在读者眼中他被看成为人与为文相背离的人也就理所当然了。

四、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该秉持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评价中国文人为人与为文背离的问题,辩证地看待背离现象。

有时读者眼中的“背离”多是源于对文艺理论的不解而形成的对文人品评的误解,因此,作为文学的欣赏者,我们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甄别“背离”的真伪:欣赏文学作品时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避免对作品人物和作者本身的臆断联系;充分认识文学作为一种文艺形态所具有的文艺的超越性,对于由此而产生的“背离”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接受。

针对具有伪饰意愿的文人,其文虽善,我们可以鉴赏学习,但是对其为人方式要坚决地批评和抵制。另外,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应秉承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充分认识到肩负的文化使命,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文人不仅要创作美文,更要寓之于理,书写有利于提升民众思想境

界、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华美篇章。在创作之外的社会活动中,文人也必须起到道德模范的带头作用,严于律己,言行一致,以自身行动引导和感染民众。

参考文献:

- [1] 刘勰. 文心雕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5.
- [2] 元好问. 中州集[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6.
- [3]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9.
- [4] 潘岳. 潘岳诗文选[M]. 北京:工人出版社,2001.
- [5] 周作人. 周作人散文[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6.
- [6] 周作人. 中国现代诗歌散文经典配乐朗诵第1辑·燕知草·跋文[M]. 石家庄:河北教育音像出版社,2009:473.
- [7]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483.
- [8] 王小波,李银河. 爱你就像爱生命[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47.
- [9] 孔子. 论语[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
- [10] 刘甫田,徐景熙. 文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02.

(责任编辑:李秀荣)